

王實味  
文藝整風與思想改造

魏時煜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2016 香港城市大學

本書版權受香港及國際知識版權法例保護。除獲香港城市大學書面允許外，不得在任何地區，以任何方式，任何媒介或網絡，任何文字翻印、仿製、數碼化或轉載、播送本書文字或圖表。

國際統一書號：978-962-937-258-3

出版

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香港九龍達之路

香港城市大學

網址：[www.cityu.edu.hk/upress](http://www.cityu.edu.hk/upress)

電郵：[upress@cityu.edu.hk](mailto:upress@cityu.edu.hk)

©2016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Wang Shiwei: A Reform in Thinking**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haracters)

ISBN: 978-962-937-258-3

Published by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Press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Website: [www.cityu.edu.hk/upress](http://www.cityu.edu.hk/upress)

E-mail: [upress@cityu.edu.hk](mailto:upress@cityu.edu.hk)

Printed in Hong Kong

# 目錄

總序	vii
前言	xi
作者序 野百合花芬芳綿長	xvii
鳴謝	xxiii

第一章 北大戀愛風波	1
第二章 海上賣文生涯	39
第三章 紅星照耀延安	85
第四章 歌頌抑或暴露	133
第五章 兩篇惹禍雜文	179
第六章 由座談而批判	219
第七章 從自由到沉寂	269
第八章 中外記者穿梭	313
第九章 命斷塵埃不落	355
第十章 思想改造之難	397

## 附錄

中篇小說〈三代〉王實味	426
譯文〈列寧遺囑〉王實味	443



讀中學和大學的時候，歷史是只要每次考試前拿課本通讀一遍，就可以順利過關的科目。回想學過的歷史課本，最枯燥的就是大學裏讀的《中國革命史》：說到東風西風、勝敗英雄，既無對命運的感慨，也無哲學的歸納；這種寫法讓我不能了解史實，又不能享受閱讀的快樂。我開始走進近代中國的歷史，是從2003年拍紀錄片開始的。此後十三年間，與六十多位五四後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對話，成為我生命中最為精彩和重要的內容。在聆聽的過程中，以往讀到的中國歷史、人文文化的雪泥鴻爪，慢慢在我思想的畫布上形成圖案；在追問的過程中，我也逐漸認識了自己，並且專注地、持續地探索人性與人生。

「北大三人行」之三人中，關於胡風的著作頗多，關於王實味的研究在近幾年逐漸展開，王凡西仍舊鮮為人知。我分別從2003、2008、2011年開始圍繞這三人訪談，獲得了超過六百萬字的口述。本書既是這些對話的筆錄，也是一份重要史料，今天能夠成書出版，讓我在驚喜之外有些惶恐：我能否讓學生輩的八零、九零、甚至零零後的讀者，感受到我所感受到的心靈觸痛？書寫好了，編輯要一篇「總序」。我推翻了幾種「八股文」的方案，決定還是從最為個人的視角，講講這三卷本成書過程中印象深刻的幾件事。

## 你為甚麼做這個題目？

這是在訪談時，最常被受訪者問到的問題。開始時，我是去給朋友彭小蓮幫忙的，她父親在胡風案中受害，她有她記錄歷史的理由。我們拍的第一位作家是賈植芳，這是我第一次享受和一位率性、幽默、淵博、親歷了八十多年風雨的人對話。此後我們拍了很多胡風先生和賈先生的朋友，他們大多沒有接受過訪問，一是覺得做影視的人沒文化，二是因為他們自己有筆，可以發聲。因為小蓮的關係，我們獲得了充分的信任，受訪者做到暢所欲言。我們也事先做足功課，因為和歷史對話，是要有基礎的，否則無法探尋到思想的深處。

2008年之後，我基本是帶助手去訪問，有了之前的經驗，仍舊得到了受訪者的信任。這時再問我為甚麼做這個題目，我回答因為從小長在一個平等、開放的家庭，對於自由平等有天然的追求。也有時，這個問題的潛台詞是，你一個在外國學電影的人，怎麼會對中國政治有興趣？我會照實說我對政治其實沒有興趣。記得第一次見到林賢治時，他就回答說，「那我們就沒甚麼好談的了。」的確，中國的一切都避不開政治；我於是進一步解釋，我對高層權力鬥爭全無興趣，但我十分關注知識分子為推動社會進步所付出的代價。

## 為甚麼用紀錄片的形式？

我是電影學博士，彭小蓮是著名導演，我們合作拍攝以胡風案為中心的紀錄片《紅日風暴》時，覺得紀錄片的形式理所當然。反而受訪者們不時會問到紀錄片長處在哪？我當時並不

能回答，最近才有比較完善的思考：首先，紀錄片可以用影像有效地還原一個時代；其次，紀錄片可以讓觀眾見到受訪者的生活環境、感受到他們的情感和氣場；第三，紀錄片與個人口述歷史不同，可以容納多重聲音與多種話語。另外，白紙黑字的書寫很多時候並不包含言傳身教的內容。曾深度研究過魯迅和胡風的學者錢理群，對於《紅日風暴》中的大部分內容都很熟悉，但是他看片後說，他沒想到，印象最深的是詩人阿壘；而這正是文字沒能帶來的感動。

從 2003 至 2007 年間，我和小蓮訪問了幾乎所有在世的胡風分子和部分已故分子的家屬，但受訪對象中，除了參加過審訊胡風分子的法官王文正，大部分都是在 1955 年肅清反革命運動中的受害者。錢理群認為，歷史不該只是從受害者的角度來書寫。當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說法時，心裏有所觸動。一方面，我不希望我們的影片太過片面；另一方面，我又覺得作為獨立紀錄片人，我的基本立場還是要站在知識分子一邊，何況四平八穩的紀錄片連 BBC 都拍不出呢！不過新的問題隨之而來。

## 你說的是哪些知識分子？

知識分子並非鐵板一塊，具體到王實味和胡風的案件中，我們發現大多數知識分子為了自保「政治前途」，都參與過對其他知識分子的批判。這種政治壓力下的人格分裂，會被冠以「文人相輕」、「宗派主義」等各種結論，只有如賈植芳、曾彥修這樣的思考者，認識到屈服於政治的文人身上五四傳統仍舊會不時抬頭，並以自身經歷，解說五四後的幾代精英知識分子，如何淪陷到政治的巨輪之下。

以前我以為文人不懂政治，但日本漢學家竹內實通過搜集、整理、編輯、出版一套毛澤東的「首版」著作（譬如《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等最早發表的版本），來呈現政治家思想和話語的形成；中國史學家高華通過解讀公開發表過的各種文獻，把政治家的邏輯和手段解釋得條理分明。如果說這兩位研究者「旁觀者清」，那麼是否王實味、胡風、王凡西三位多少有些「當局者迷」呢？抑或他們三人其實了解政治，但不被收買，而選擇對抗？

我從2008年開始，把這三位1925年北大文預科班同學，相互比較、研究和考量，看到這三位起點相同、道路與命運不同、但都初衷不改的主人公，代表了中國大多數五四後的知識分子面對革命做出的選擇——一則加入中國共產並留在黨內，二則不入黨而做黨的「同路人」，三則成為共產黨的反對派。這三人都按照自己的信念堅持到生命最後，並沒有因外部壓力而改弦易轍，用王實味的話說，有着至剛至硬的骨頭。我覺得比較他們三人的命運，會打破一個神話：文人為了保持人格完整，信念越堅定、犧牲就越大。王實味死於1947年，近20年才開始被認真研究；胡風受難於1955年，但從80年代起有機會重寫自己的歷史；王凡西於1930年被開除出黨，卻得以在他鄉流放的過程中，反思中國的歷史，並且以自己的記憶悼念王實味，並且促成胡風妻子梅志寫的胡風傳記被翻譯成英文出版。如此說來，歷史有很多縫隙留給知識分子，命運並不完全遵從哪怕是最高領袖的邏輯。

魏時煜



魏時煜博士與我相識十多年了。因上海導演彭小蓮的介紹，我為她們當時正在製作中的紀錄片《紅日風暴》做了點諮詢工作。這部影片2009年在香港國際電影節上映時，魏時煜請我去觀看，我在劇場中，見證了觀眾的熱烈反應。此後我們常在午餐、茶敘之間，聊到中國現代作家的命運的話題，並且關注到延安時期的經歷對於他們的改變。

早在1998年，韋君宜的《思痛錄》就以現身的親歷，描述了當年衝破重重藩籬、遠赴陝北高原的那一批批年輕知識分子、文化人投身革命後的苦悶及遭遇，以其坎坷一生後晚年的省思，展現了所謂「兩頭真」的覺悟之道。三年後，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出版，以延安整風運動為中心所引發的新史學熱潮，令人矚目至今。

當時魏時煜在拍攝與胡風相關的人和事，我遂建議她利用手中攝影機、錄音機趕快去「搶救資料」，抓緊時間訪問碩果僅存的延安文化人。因專業的關係，我更關注的是延安作家群中的丁玲、王實味、蕭軍、周立波、何其芳、周揚等人。我希望她能拍攝作家傳記記錄片系列，題目就叫做：「視頻：中國現代作家們」。但魏時煜的視野更為前瞻，她想拍攝的是「文人與革命」，她更為關注的是知識分子面對革命大潮的不同選

擇。她是個行動派，說幹就幹，帶着她的助手，按照我們商量的名單，開始訪問延安老文化人：曾彥修、何方、李銳、灰娃等，甚至遠赴日本，拜訪了對中國文人有獨到研究的漢學家竹內實、吉田富夫、長堀祐造等人。接着，又因這些受訪者的介紹與建議，她繼續訪問了一些在中國大陸鮮為人知、在香港素有影響的知識分子和政治家；甚至遠赴美國，拍攝了李敦白這樣的美籍中國共產黨員。這些受訪者大多是近代歷史的見證者，有不少人在接受過訪問之後已先後去世。

作為在海外攻讀過文學和電影理論，又有志於以記錄片來重構中國近現代知識分子歷史的學者，魏時煜不僅比從事中國現代文學、文化研究者更具現代性的觸覺，且更有開拓性的視角。正是在歷史材料的梳理中，她抓住了王實味這個典型，從一個貌似「偶然」的人際關係——「北大三人行」的組合的歸宿，顛覆官方修史的主流話語權，揭開了大歷史現場中的個性不同的中國知識分子的悲劇及其各不相同的結局。

王實味、胡風和王凡西這三個來自不同省份的平民子弟，於1925年秋考入北京大學，被分在文預科一個小班中。王實味、胡風這二位的名字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大案」人物，大家耳熟能詳，王凡西則鮮為人所知。當時北大以自由、民主為標榜，是早期中共在學界最主要的兩個「根據地」之一，另一間大學則是上海大學。陳獨秀、李大釗、張申府、張國燾均出自北大，連毛澤東都在北大圖書館工作過。王實味和王凡西都是在北大加入了中國共產黨，胡風則在日本時參加了日共。後來王實味被打成「托派」，王凡西則是堅定的「托派」；胡風

與他們二位似非同路人，但批判胡風集團的時候，也說其成員中不乏國民黨特務和托派分子。

王實味其實並沒有在組織上參加過托派。眾所周知，他是因為1942年所寫的一篇散文〈野百合花〉成為延安整風的重點對像，其最大的、不可洗刷的罪名是「托派反革命」。他的這篇文章與丁玲寫的〈三八節有感〉其實不過犯了知識分子的老毛病，發發牢騷，對延安「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的不公平有意見，罪不致於殺頭。丁玲因與毛澤東較有來往，且文名甚大，不像王實味落得那樣的下場。但王實味後來何以成為「托派」，很多人說是康生所為，但是書中顯示出一條更為複雜的綫索。

本書附錄中首次全文披露的王實味的小說〈三代〉和他翻譯的〈列寧遺囑〉，就是由已故日本漢學家竹內實先生生前交給魏博士的。從王實味轉譯的這篇〈列寧遺囑〉裏，我們才知道斯大林「矯旨」：將列寧對斯大林的批判及否定全部抹去，將列寧對托洛斯基的讚譽也改成了批判，這是蘇共黨內一件訟案。結果王實味卻因此成了第一個在中國被殺的「托派分子」，這個冤案直到1991年才獲平反。

托派這個名詞，長期以來是中國政治語境中一個極為「有害」及敏感的反革命名號。它的原名是「中國共產黨左派反對派」。據該執委會在1931年5月5日於上海致托洛斯基的信所言：「四個分別存在的中國反對派現在已經統一了。」而這個統一大會是在當年的5月1日於上海召開的，從四個反對派團

體選出了17名代表，加上四名列席代表，代表了483名成員通過了共同政綱和其他決議案，選出了陳獨秀為書記處書記，組織部主任陳亦謀、宣傳部主任鄭超麟等。機關報定名為《火花》（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這483名成員中並不包括王實味，王凡西就證實他沒有參加托派組織。

王實味是1926年1月由陳清晨介紹加入中共的。這位陳清晨就是寫信給魯迅的那個代表托派的陳仲山，魯迅於病中委托馮雪峰回了《答托洛茨基派的信》。而他的北大同學中的「革命同志」王凡西，在後來留學蘇聯時就參加了托派，當時的中國留蘇學生有四百多人，其中約一半參加了「托派」，包括蔣經國。回到主題，「托派」與中國現代文學史確有千絲萬縷之關係，從另一個意義而言，中國現代文學的發展過程的人和事，又與中共黨史糾纏在一起。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確實「繞不開」托派。我之前讀《陳獨秀晚年文集》、《鄭超麟回憶錄》及王凡西的《雙山回憶錄》，才了解以前新史學研究中忽略了這個派別在中國政治進程中的存在及其作用。托派由陳獨秀、鄭超麟到王凡西，這三人代表了三個不同時期的托派的領軍人物，本身就是一個十分值得重視的研究課題。

本書由作者獨自策劃，進行了大量的田野調查，訪問眾多當事者或已故人物的親屬，爬梳散落於文學界、歷史檔案及海外圖書館的資料，尤其是關於托派的原始材料、文字、人事等，彌足珍貴。因作者身處海外，可以不受意識形態的困擾，自由思考、獨立寫作，其切入角度之新穎，表現手段又契合現代影象的特徵，故能發掘真像，還原史實，皆屬可圈可點，是一部值得一讀的好書。

經多年的辛勤努力，魏博士不僅在幾年前拍出了一部高水準的獨立電影《紅日風暴》，今年又有這麼一部沉甸甸的力作奉獻給中文讀者。謹此向作者表示祝賀，期待她「厚積薄發」，再有同一類型的題材推出，在這條崎嶇的探索小道上繼續前進吧！不畏艱險、不怕孤獨地翻過那一個個山坳，穿越那條長長的時光墜道，追蹤着那一個個漸至湮沒的腳印，我相信她將看到先驅、先行者回眸的微笑。

石在，火種是不會滅的！

孫立川  
香港天地圖書公司總編輯  
寫於香港穆穆書齋  
2016年端午時節



野百合花芬芳綿長

我最先看到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是收入戴晴的《梁漱溟、王實味、儲安平》一書中的〈王實味與《野百合花》〉。從寫作的角度來說，這是一篇非常動人的紀實文字，讓我看到一個與眾不同的生命歷程。我立刻找到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原文，以及他早年的小說。閱讀之間，我被字裏行間的真摯與他生命的熱力所感動，當時就有衝動想要拍攝王實味的紀錄片。那時是2008年。今年是王實味誕生110周年，我很高興不但可以出這本書，還能完成一部關於王實味的紀錄片。

## 尋找新的材料

2008年時，溫濟澤編的《王實味冤案平反紀實》（1993）、朱鴻召編的《王實味文存》（1998）、黃昌勇編著的《王實味：野百合花》（1999）和《王實味傳》（2000），以及張均的《王實味全傳》（2000）都已出版。2000年之後，關於王實味的論文、文章也有發表，但是新材料很少，總體上也沒有超越以上幾位作者的論述。可以說從2000年至今，王實味的研究似乎撞到了南牆，雖然有興趣的人仍舊很多，但因為材料發掘之難而無法繼續。

相比較胡風和王凡西，王實味的材料最少：照片只有一張；除了發表的文章之外，沒有留下書信和日記，更不要說自傳了。上面提到的兩部王實味的傳記，以西方人物傳記的標準而言，跳過了太多時間點、也缺少可靠的細節。因此在我心目中，王實味不可能有真正的「傳記」，但是他的意義卻很值得再深入探討。



因為研究年份不同，我在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有機會納入到上面提到的幾位學者們未用的重要材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1年首版的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一書中，對延安整風的論述有一個更加廣闊的黨史背景，因此對於王實味事件的意義提出了不同以往的問題。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3年出版的蕭軍《延安日記》中，包括了從1942年5月25日到12月18日之間，蕭軍寫到王實味的十篇日記，從一個事件中人的角度，對於延安批判王實味的情況有生動而充滿情緒的描述。當同時期《解放日報》上關於王實味的文章都極盡批判、醜化之能的時候，蕭軍的文字讓我感受到作為一個真實的人的王實味。利用香港各大學圖書館的資源，我還讀到40年代延安《解放日報》、《中國青年》等報刊上的相關文章，陳學昭、舒湮、趙超構等人寫的關於延安的報導，讀到王實味的北大同學好友王凡西在香港發表和未發表的關於王實味的文字，並且找到了王實味30年代的翻譯過的西方文學作品，閱讀了他的「譯者序」和其他人的序文。

在尋找新材料的過程中，最大的驚喜，莫過於2010年我到京都訪問日本漢學家竹內實的時候，從他那裏獲得的1930年《展開》雜誌的複印件。這本當年被作為王實味的反革命證據的「托派雜誌」中，有三個與他相關的材料：一是他的中篇小說〈三代〉，二是他從英文轉譯的〈列寧遺囑〉，三是一則支那書店即將出版王實味小說集《三個落伍兵》的廣告。這些材料從未收入過王實味的各種文存。這些材料不僅延伸了我對王實味事件的理解，還加深了我對王實味的性格和他的所謂「人性論」的認識。

## 發現新的視點

與以往的王實味研究者不同，我在比較文化和文學理論領域受過完整和系統的訓練，並且有十年以上製作歷史紀錄片的經驗。文學理論要求我追本溯源，比較文化幫助我東西貫通，而這兩點對於審視五四前後湧現的知識分子都非常重要：他們接受了西方民主、科學的啓蒙，大多通曉最少一門外文、翻譯過西方文哲作品，是中國知識分子中人性和心靈最為開放的一代；從知識結構來說，他們遠比50年代高校文理分家之後的幾代人淵博，既有有強邏輯思維、理論分析能力，又有很強的創作力，能寫出十分感性、詩意的文字。如果不能認識到他們的這兩個方面，並且同時考量，我們就不可能真正地理解他們的行為與文字。

作為一個紀錄片導演，我並不執着於單一的視點，反而崇尚眾聲喧嘩中浮現出的多重真理。以此理由，我說服極少接受訪問的王旭楓先生（王實味的兒子）、薄平女士（王實味的學生和1939年在延安的妻子），解答了我的很多問題。在訪問與王實味同時期在延安的知識分子幹部時，我邀請曾彥修（已故）、王懷安（已故）、高向明、黎辛、李銳、何方、灰娃、韓書田等人從他們個人的角度，分享他們對於延安整風前後的記憶。除了高向明和黎辛，其餘老人大多沒有專門撰文寫王實味的文章，因此沒有被問道過是否記得王實味之人與文，但他們的確有自己的記憶。在訪問研究王實味問題成績卓著的宋金壽、戴晴、黃昌勇等人時，我會着重他們為甚麼會做王實味研究。同樣在訪問研究延安魯藝的王培元，以及魯迅研究專家林

賢治、朱正和錢理群時，我會詢問他們如何看待王實味和魯迅、王實味和其他延安作家的關係。

此外，在搜索英文文獻的時候，我發現由於整風中王實味最大的罪名是「托派反革命」，他的案件引起了一些第四國際（托派）和其他西方學者的注意。美國女教授戈德曼（Merle Goldman）早在她1967年研究40、50代中共整風的英文專著中，就提到王實味事件。而英國教授班國瑞（Gregor Benton）則在1975年，率先把王實味的〈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藝術家〉兩篇雜文翻譯成英文，並在2015年把這兩篇散文收入英國出版的《中國托派文獻》。80、90年代，則有更多漢學家研究了共產黨不同時期的整風，但王實味的案件並沒有被細緻研究。通過班國瑞的介紹，我於2015年初，在美國鳳凰城訪問了被稱為「毛澤東最信任的美國人」的美國籍中共黨員李敦白（Sidney Rittenberg），了解到他對「整風」和「思想改造」的切身體會：他用了六年時間在單身監禁中，完成了自己思想改造。他的講述讓我從另一個角度，看到「改造失敗」之王實味的意義！

對於才華橫溢、人性充沛的王實味，對於他那代知識分子的動盪人生和多舛命運，對於個人面對強權時如何支撐信念，我在好奇中閱讀、研究、交談、追問，漸漸就形成了這本書。作為一個紀錄片作者，我比其他研究者更加重視影像，因此在整個研究過程中都十分注意圖片和影像資料的搜集。本書中的一百六十多幅圖片中，除了部分剪報、書影是圖書館找到的以外，照片大多來自受訪者的家庭相簿。比如延安文藝座談會與

會者的合影，幾位受訪者家裏都有比已經出版的書籍中更為清晰的照片。另外，我還在美國國會圖書館、美國國家資料館、香港電影資料館等地方，找到了延安 30、40 年代的影像。這些影像裏包含着有別於文字的信息，能夠讓我這個後輩的人，更加直接地感受到那個時代的人的風貌。30、40 年代是一個木刻盛行的時代，部分由於魯迅先生的推動、部分由於印刷方便，很多書刊都用木刻作品為封面，因此木刻也代表了那個時代的左翼藝術。和出版社商量之後，決定把我搜集到的部分照片、木刻、書影，與文字一同印出，以幫助今天的讀者「看到」當年的景象。